

论“藏彝走廊”

李星星^①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概念内涵系指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费孝通语），系借用“走廊”这个普通词语来特指一个具有“走廊”地貌特征的特殊地带。这个地带的地理位置大体在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过渡的区域内，在地貌学上属藏东、川西高原峡谷区。

费先生当时仅对“藏彝走廊”作了大体的界定。他指出，这条走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瑜”地区。“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②。

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意在为民族学及民族社会学研究开辟一种新的视野。他“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③。并认为“藏彝走廊”这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对于民族学及民族社会学的深入研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如说：“我

①作者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②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③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①。他特别提到：“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②

“假如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这个“假如”无疑是学术上的一个严重挑战。

笔者为描述“藏彝走廊”曾发表题为《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③的论文，尔后又以《论“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格局》^④为题，提出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走廊”构造问题。笔者以为，“藏彝走廊”的确是中国若干“民族走廊”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其走廊特征最明显，地形最复杂，“活着的历史遗留”保存得最丰富和完好，积淀的历史文化奥秘最多、最吸引人。为此，笔者将不揣冒昧以下述方式试着再描写一番“藏彝走廊”。关于“藏彝走廊”高山峡谷的地貌构造，以及“民族走廊”产生的自然历史原因及“民族走廊”的定义，请详见上述拙文，以下不再赘述。

一、“藏彝走廊”地理

1. 位置及范围

①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③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载《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2期。

④拙文待发表。



“藏彝走廊”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中国地势第三级台阶向第二级台阶过渡的地带上，以藏东、川西北高原峡谷地区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川为其自然地理基础。故“藏彝走廊”亦呈西北—东南走向，其平面形式呈条带状。其坐标位置大体在东经 97～104 度，北纬 25～34 度之间。直线距离南北长约 1200 公里，东西宽约 750 公里。“走廊”南北两端及东西两侧的界限，大体以其自然形式的转折地带为标志，例如“藏彝走廊”的西界，当以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与横断山系西北侧边沿接触地带为界，如此等等。

“藏彝走廊”北起甘青交界的西倾山南侧及阿尼玛卿山和岷山北侧，大体在黄河至洮河一线，亦即在青海果洛、海南及甘肃甘南交界地区。南抵滇西高黎贡山、怒山及云岭南端，以及金沙江南侧至乌蒙山西侧一线；南界呈曲线，大体在云南腾冲、保山、洱源、宾川、元谋至会泽一线。西界沿巴颜喀拉山西侧，南抵横断山系西北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宁静山之北端，即大体在青海鄂陵湖、玉树至西藏昌都、察隅一线。其东界由北而南自岷山东侧沿龙门山、邛崃山、大凉山东侧，直抵乌蒙山以西，即大体在甘南宕昌，四川平武、北川、九顶山、宝兴、天全、峨边、马边至云南昭通、会泽一线。

从现实行政区划来说，“藏彝走廊”的范围包括：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及武都地区所辖部分县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以及黄南、海南、玉树藏族自治州所辖部分县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峨边、马边彝族自治县、攀枝花市，以及绵阳、雅安、宜宾市所辖部分县地；西藏昌都地区东部各县地；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地区，以及腾冲、保山、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川、昭通所辖部分县地。



2. 山川及分水岭

“藏彝走廊”主要属高山峡谷地貌，山川众多，山高水急。“藏彝走廊”中的山脉分属青藏高原、横断山、秦岭这三个大的系列，大体包括：青藏高原东缘昆仑山系的阿尼玛卿山、岷山、巴颜喀拉山及唐古拉山系的念青唐古拉山等山脉，横断山系的伯舒拉岭、高黎贡山、他念他翁山、宁静山、雀儿山、沙鲁里山、大雪山、邛崃山、大凉山等山脉，秦岭山系的龙门山等山脉。这些山脉均大体呈北—南走向。山脉除构成分水岭而外，其两侧山麓地带及山脊多构成山地自然通道。

“藏彝走廊”中的河流与山脉走向一致，大体亦呈西北—东南走向。其河谷地带多为自然通道。主要河流有：涪江（属嘉陵江一级支流）、白龙江（为嘉陵江上游）、岷江（属长江一级支流）、大渡河（属岷江一级支流）、黄河、青衣江（属岷江一级支流）、安宁河（属雅砻江一级支流）、雅砻江（属金沙江一级支流）、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澜沧江、怒江、独龙河及恩梅开江（属伊洛瓦底江上游）等。其中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为“藏彝走廊”中流径最长、支流最多、流域最广的河流。因此，李绍明先生称此山脉相间、六江并行的区域为“六江流域”，并称“这一区域即藏彝走廊”^①。

“藏彝走廊”中的分水岭不仅多为交通之要冲（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山口），而且大多还是比较重要的划界地带，或区分道路，或区分族群和文化，如史籍所载：“邛崃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②“藏彝走廊”中的分水岭主要有如下一些：岷

^①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原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续汉书》严道县、旄牛县下刘昭注引《华阳国志》佚文。



山山脉为白龙江与岷江、黄河的分水岭；岷山雪宝顶为岷江与涪江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为金沙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北侧南端的果洛山为大渡河与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南端的牟尼芒起山及大雪山脉为雅砻江与大渡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南侧一些山脉，以及雀儿山、沙鲁里山为雅砻江与金沙江的分水岭；邛崃山脉为岷江与大渡河、青衣江的分水岭；邛崃山脉的夹金山、二郎山及大相岭为大渡河与青衣江的分水岭；大雪山脉南端牦牛山为雅砻江与安宁河的分水岭；大雪山脉南段拖乌山为大渡河与安宁河的分水岭；大凉山为安宁河与大渡河、金沙江的分水岭；唐古拉山东段一些山脉及横断山系的宁静山为金沙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唐古拉山脉、他念他翁山及其南段怒山为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念青唐古拉山脉为怒江与雅鲁藏布江的分水岭；伯舒拉岭为怒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支流察余勒河的分水岭；伯舒拉岭南段及高黎贡山为怒江与独龙河及恩梅开江的分水岭。

3. 分段与分区

从南北纵向来看，由北而南可将“藏彝走廊”分为北、中、南三段。走廊北段大体从阿尼玛卿山至岷山一线起，到大相岭南侧及峨边、马边一线。北段主要属岷江、大渡河流域范围。走廊中段，北以大雪山及大渡河为界，南以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一线为界。中段主要为雅砻江及其支流鲜水河、理塘河、安宁河，以及部分金沙江流域地区。走廊南段属金沙江以南及以东至高黎贡山南端、保山一线，主要为怒江、澜沧江及金沙江流域高山峡谷地区。

从东西横向来看，由东而西可将“藏彝走廊”大致分为八个区域：（1）北段盆沿区域。从岷江、大渡河东侧一线至龙门山、邛崃山东侧，亦即至四川盆地西沿一线。主要为白龙江、涪江、



湍江、青衣江流域地区。包括今甘肃武都、文县，四川九寨沟、平武、北川、宝兴、天全、峨边、马边等县地。(2) 北段峡谷区域。为岷江和大渡河流域峡谷地区，主要包括今四川汶川、理县、茂县、黑水、松潘、金川、小金、马尔康、壤塘、丹巴、康定、泸定等县地。(3) 东南凉山区域。其东以金沙江东侧一线为界，其西以沙鲁里山及理塘河为界，其北以大渡河南侧一线为界，其南以黑盐塘、殿沙关至云南巧家一线为界。主要为大小凉山地区，即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县地。(4) 西北高原区域。大体在岷江和大渡河峡谷区域以西，延伸至青海鄂陵湖至玉树一线，大体包括今四川松潘（部分）、若尔盖、阿坝、红原、色达、石渠，以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部分、果洛藏族自治州及玉树藏族自治州部分县地。(5) 中段雅砻江区域。主要包括今四川甘孜、炉霍、道孚、新龙、雅江、九龙、理塘等县地，以及石渠、德格、巴塘、稻城、木里、盐源、冕宁诸县部分地带。(6) 南段金沙江东流段区域。主要包括今四川攀枝花市、盐源、木里，云南宁蒗、中甸部分地带及金沙江南侧云南丽江、永仁、华坪、永胜、元谋诸县地，以及鹤庆、宾川、盐丰、大姚、武定、会泽诸县部分地带。(7) 西南金沙江纵谷区域。主要包括今四川德格、白玉、巴塘、乡城、得荣，西藏江达、贡觉，云南德钦、中甸诸县地，以及四川石渠、青海玉树、云南丽江所属部分地区。(8) 西南两江区域。主要为澜沧江、怒江高山峡谷区域，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东部、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玉树、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区。

如果在“藏彝走廊”平面上画一幅坐标，使横坐标线大致平分走廊南北，纵坐标线大致平分走廊东西，那么，纵坐标大致为东经 100 度线，而横坐标则恰好为“神秘的北纬 30 度线”；坐标



原点在理塘河西侧，金沙江、雅砻江分水岭——沙鲁里山脉中段，差不多正好在走廊中心。纵坐标即东经 100 度线，大致是走廊东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青衣江与西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纵流地带的分界线。坐标划出四个象限，其大体情况是：东北象限为北段盆沿区域、峡谷区域，以及部分高原区域；东南象限为雅砻江区域、凉山区域及金沙江东流段区域；西南象限为西南两江区域、金沙江纵谷区域；西北象限为部分金沙江纵谷区域和部分高原区域。

4. 纵横通道

“藏彝走廊”依山川走向形成若干自然通道。由于“藏彝走廊”正处在地壳厚度急减地带，河流从青藏高原沿断裂带下流，切割高原面而形成高山峡谷。因此，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进入“藏彝走廊”，有若干山川构成的自然通道。其中主要的有如下六条。

通道一：自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沿阿尼玛卿山（积石山）两侧，从黄河大拐弯处向东，以及从甘南洮河上游地区向南，而进入川西北高原草原地区。尔后，在岷山西侧沿岷江上游顺岷江河谷南下，经成都平原西侧而接青衣江流域，再往南越过大相岭和大渡河即进入安宁河流域，或者顺大渡河经峨边、马边，沿大凉山东侧即金沙江西侧一线南下。此路线在历史上形成为联系蜀滇乃至南亚的重要交通路线。秦汉时期开通的五尺道和零关道，均在这条通道的范围之内。

通道二：自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沿黄河南侧及巴颜喀拉山东北侧，进入川西北高原大渡河上游地区，尔后顺大渡河并沿大渡河峡谷南下，在大渡河向东拐弯地区与沿岷江南下的道路相汇。

通道三：自青藏高原通天河上游地区，向东至称多、玉树一带，沿金沙江东侧及巴颜喀拉山南麓，向东进入雅砻江上游地区，



再顺雅砻江上游各支流南下，其西侧联系金沙江流域，其东侧与大渡河、安宁河流域相通，往南即与安宁河、金沙江相汇，渡过金沙江而入云南境。

通道四：自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北侧及通天河草原地区，向东沿金沙江、澜沧江上游河谷及沿两江之间的宁静山、云岭山路南下，而至云南丽江、剑川、洱源、永平一线，再往东南延伸，即可沿哀牢山及元江一线运动。

通道五：自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东段两侧，向东沿怒江、澜沧江上游及两江之间的他念他翁山、怒山山路南下，而至滇西保山、腾冲一带。由腾冲往西，经缅甸之密支那可进入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在保山一带，往东北可进至洱海地区，往东南可进入澜沧江下游地区。

通道六：自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沿雅鲁藏布江北侧及念青唐古拉山南侧向东，进至怒江西侧、独龙河上游及察余勒河地区，再沿独龙河上游及怒江西侧山路南下，顺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南入缅甸的密支那地区。或者，顺察余勒河南下，西折可转入东北印度，继续向南则可通过印缅边界一些山口而入缅甸，进至缅甸亲敦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

除了上述南北纵向的通道而外，“藏彝走廊”中还有不少东西横向的通道作为纵向通道联系的桥梁。有些东西向通道可横贯整个走廊。关于横向通道，李绍明先生曾指出，在“藏彝走廊”中，“还有着横跨横断山脉从东到西的古道。这便是通常所称的‘茶马古道’。其中一条西起今四川雅安，途经（天全）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而达拉萨；从拉萨便可南下不丹、尼泊尔与印度。这条道路大体相当于今日的川藏公路。另外还有一条从今云南大理起，途经丽江、中甸、德钦、盐井到昌都再往西去拉萨的古道。



这条路大体相当于今日的滇藏公路”^①。

除此而外，横向通道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其一，即后来的川藏公路北线，西起雅安至康定，便折向西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过金沙江而至昌都，与今川藏公路南线相汇。其二，从川西平原西沿的北川起，溯湔江向西，经今阿坝的土门、茂县、汶川，再溯杂谷脑河向西，经大渡河上游地区而西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其三，从川西平原西沿的灌县（今都江堰市），至阿坝的映秀而西折，越巴朗山，经小金、丹巴、八美，与今川藏北路相汇；继续沿北路西行至马尼干戈分道，经石渠、玉树而至青海通天河草原地区，并可接青藏大道。其四，从四川盆地西南边沿即从四川乐山和宜宾地区的沐川或屏山出发，经新市镇而入大小凉山区域，再由雷波经美姑、昭觉、西昌、盐源、木里，进入金沙江纵谷区域，由此向西或向南均可接滇藏“茶马道”。其中，由西昌经盐源至木里，或经盐源、宁蒗而至丽江的道路，史称“闰盐古道”。其五，从云南巧家一带西渡金沙江，经四川宁南之华弹、会东、会理、米易、盐边，再入云南境，经华坪、永胜而至丽江，西接滇藏“茶马古道”。

二、“藏彝走廊”历史

“藏彝走廊”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从古至今，在这条“走廊”中活动、栖息的民族或族群主要是操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的民族或族群。“藏彝走廊”这个术语，在费孝通先生提出时系指“处在彝藏之间”的“走廊”。笔者进一步将其引申为：“藏彝走

^①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 1995 年版。原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廊”主要是操藏缅语族各种语言的历史民族或族群在其中活动的历史区域。这个引申义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名称也较相符。

毫无疑问,“藏彝走廊”的形成直接与操藏缅语族各种语言的历史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活动相关。从“藏彝走廊”开始形成至今,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要想凭借历史的方法或民族学的回溯方法还原“藏彝走廊”历史的真实面貌,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笔者只能尽量根据有限的考古资料、历史文献记载以及民族志材料,来进行勾勒和描述。由于资料的欠缺,加之追溯历史的时间跨度又相当大,模糊程度也相应较高。因而在描述中出现笔者的主观武断、出现遗漏或失误,都在所难免。不过,对于“藏彝走廊”历史的描述,笔者可算是首次作出尝试,想必能为“藏彝走廊”历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见解。

1. 历史分期

笔者将“藏彝走廊”的历史大体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即“藏彝走廊”的形成阶段,或谓形成期。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大体在距今 4100 年以前(即在中原地区的夏以前),其上限不确定。第一阶段大体又分为两期:大约距今 5000 年以前可谓形成阶段前期;5000 年以后至 4100 年,可谓形成阶段后期。

第二阶段,为活跃阶段,或谓活跃期。其时间上限距今 4100 年,即公元前 2100 年;下限距今 700 多年,即公元 1260 年。第二阶段又大体分为如下四期:一期,自公元前 2100 年至公元前 1100 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二期,自公元前 1100 年至公元前 250 年(相当于西周至东周末);三期,自公元前 250 年至公元 320 年(相当于秦汉至西晋);四期,自公元 320 年至公元 1260 年(相当于东晋、隋唐至宋末)。

第三阶段,为衰落或“休眠”阶段,或谓衰落期。时间大体



为公元 1260 年以后，即包括元、明、清时期。

笔者对“藏彝走廊”历史进行的分期，主要依赖于对考古、历史文献及民族志材料的分析和综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见解^①。其中的年限均属近似值。

附表：

阶段	时间	相当于中原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 “藏彝走廊”形成 阶段（或形成期）	上限不确定下 限距今 4100 年 以前	前期 距今 5000 年以前	仰韶文化早中期
		后期 距今 5000 年以后至 4100 年	仰韶文化晚期和 龙山文化时期
第二阶段 “藏彝走廊”的活 跃阶段（或活跃 期）	上限距今 4100 年（BC2100 年） 下限距今约 740 年（AD1260 年）	一期 BC2100 年～BC1100 年	夏、商
		二期 BC1100 年～BC250 年	西周至东周结束
		三期 BC 250 年～AD 317 年	秦汉至西晋结束
		四期 AD 317 年～ AD1260 年	东晋、隋唐至宋 末
第三阶段 “藏彝走廊”的衰 落阶段（或衰落期 或“休眠”阶段）	AD 1260 年	元、明、清	

①拙文待发表。



2. “藏彝走廊”形成期

从理论上说,“藏彝走廊”作为适宜人类活动的自然地带,早在史前,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为人类利用。而作为在中国特定自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民族走廊”,“藏彝走廊”的形成当开始于新石器时代。从考古发现来看,到目前为止,在“藏彝走廊”范围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像昌都的卡若、元谋的大墩子、西昌的礼州、汉源的狮子山、丹巴的中路、汶川的营盘山,以及成都平原西部边缘的宝墩等这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考古文化遗址,其年代大体都在距今 5000 年至 3500 年之间,均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当然并不排除有个别的年代超出距今 5000 年的上限。因此可以说,在“藏彝走廊”内,至今尚未发现距今 5000 年以前至 1 万年(新石器时代革命的理论年限)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至少到目前为止应是我们作历史判断的基本依据。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远在一两万年前“藏彝走廊”地带已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居住活动,如汉源的富林、攀枝花回龙湾的旧石器时代非农业人群居住的遗址。另外,在岷江、雅砻江、金沙江流域也还有不少旧石器采集点的发现。而从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看,都曾有过长期的发展。加之,从四川盆地边缘即绵阳西部的边堆山遗址(年代上限在 5000 年上下)、广元中子铺遗址(年代上限为 7000 年前,甚至更早)来判断,距今四五千年前,甚至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群有一些已进至四川盆地及成都平原边缘^①。这些情况说明,距今 5000 年以前,“藏彝走廊”内早已有新石器时期人群居住和活动了,只是至今尚

^①段渝:《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未发现其踪迹而已。

这就意味着促使“藏彝走廊”形成的史前藏缅语族群进入“藏彝走廊”的时间，有两种可能：一、在距今 5000 年以前就有一些族群进入“藏彝走廊”；二、距今 5000 年以前可能确无新石器时代人群涉入，而是在 5000 年以后才进入“藏彝走廊”。当然，无论哪种判断，将“藏彝走廊”形成期的下限确定在距今 4100 年，都是可以成立的。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关黄帝与炎帝的出生、黄帝与嫫祖、黄帝子昌意、颛顼及其子、鲧和禹，以及有关颛顼与共工争、禹治水、后稷、蚕丛氏等神话传说，多属反映“藏彝走廊”形成时期的故事。大体而言，有关黄帝与炎帝的出生、黄帝与嫫祖、黄帝子昌意、颛顼及其子以及鲧和禹的神话传说，当属反映“藏彝走廊”形成前期的故事；而有关颛顼与共工争、禹治水、后稷、蚕丛氏等神话传说，则当属反映“藏彝走廊”形成后期的故事。总之，典籍记载大量有关的神话传说，大体与“藏彝走廊”形成时期相对应。因此，“藏彝走廊”的形成期亦可以称为神话传说时期。

至少先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距今 4100 年以前，藏缅语族各历史民族或族群已陆续进入或经过“藏彝走廊”。距今 5000 年以后至 4100 年，已有大量的历史民族或族群通过“藏彝走廊”而进入到冲积平原边缘或平原地区。距今 5000 年以后至 4100 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原仰韶文化正向龙山文化推进，中原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正在形成之中，出现了全国最早的青铜器（马家窑遗址青铜刀，年代距今 5000~4300 年），说明此时已处在辉煌的青铜时代的前夜。而在“藏彝走廊”中，也已出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与“走廊”中新石器时代



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宝墩考古文化（年代上限为距今 4500 年）^①，已出现在岷江峡谷出口，即出现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这一切都表明，将“藏彝走廊”的形成期确定为距今 4100 年以前，是完全合理的。

3. 假 说

有史以来，在“藏彝走廊”中活动和居住的主要都是属于藏缅语族各个不同语支的历史民族或族群。至今，“藏彝走廊”仍然主要是藏、彝、羌三大语支民族的聚居地。笔者曾在《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一文中，作过如下推测：

“假如藏、彝、羌三大语支在谱系上确属从同一个母体分化而来的，而且其中许多语言尚包含着不少原始藏缅语的成分，那么，试问：各语支从母体发生分化的始点区域在哪里？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假如能够确定藏缅语族母体发生分化的原始区域，那就有可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各语支民族迁移的方向和运动的轨迹。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反之亦然，即从各语支民族历史迁移运动的方向和轨迹，则可以反推其分化的原始区域的大体方位。正是这个思路，使笔者推测，各语支分化的原始区域当在高原某处。”

“从青藏高原向东运动，大体有四条线路进入谷地：其一是，沿岷山北麓进入黄河、渭水流域，以及嘉陵江上游谷地；其二是，从岷江、大渡河上游进入川西北峡谷地区；其三是，从雅砻江、金沙江上游进入川西高原峡谷地区及川滇交界地带；其四是，从澜沧江、怒江上游进入滇西北及滇西地区。除沿岷山北麓的路线

^①关于宝墩遗址与“藏彝走廊”的联系，请参见段渝著《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外，其余路线都是在切割高原沿川谷行进。这些山川都是呈西北—东南走向。而根据（今藏缅语族）各民族多传说其祖先是来自西北方向迁移而来的，故可以大体判定，各语支（即藏、缅、彝、羌语支）分化的原始区域就在那些江河上游的高原某处。”^①

接着，笔者又在《论“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格局》一文中，对“藏彝走廊”中的历史通道做了更加细化的工作，并提出了藏缅语族各语支民族分别选择不同通道运动的粗略意见。在此，笔者将明确提出如下假说：

在新石器时代，时间至迟到距今 4000 年以前，古藏缅语族族群从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六江的源头以上地区，即从青藏高原东缘某处或某几处，主要通过前述六条纵向通道陆续进入“藏彝走廊”地区，并经过“藏彝走廊”而散布开来。这六条通道分别引入了古藏缅语族的三大支人群，亦即缅语支族群先民、彝语支族群先民、羌语支族群先民。大体而言：缅语支人群出自怒江、澜沧江源头地带，主要取怒江、澜沧江及独龙河构成的通道，即取前述的“通道六”，部分也取“通道五”；彝语支人群出自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上游源头地区，大体以通天河草原为中心，主要取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构成的通道，即取前述“通道四”、“通道三”，也有部分可能取“通道五”；羌语支人群出自岷江、大渡河及雅砻江源头以上高原地区，主要取岷江、大渡河及雅砻江构成的通道，即取前述“通道一”、“通道二”，有一些也可能取“通道三”。

由于古藏缅语族群迁移活动的区域分化，尤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迁徙途径，而使古藏缅语族发生分化，终至形成了藏缅语族

^①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载《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的缅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藏语支及羌语支等语言，尔后才又从各语支中分化出不同语种的历史民族。

提出以上假说的理由：其一，据语言学调查研究，现今生活在西南地区的诸少数民族，如彝、纳西、傈僳、哈尼、拉祜、基诺、藏、羌、普米、白、怒、独龙、景颇、阿昌等，分别属藏缅语族几个语支（如彝语支、缅语支、藏语支、景颇语支、羌语支）。他们不仅在语言上相近，而且有着一些古老的共同习俗，例如，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志资料，缅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民族先民都有父子联名叙谱的文化传统，彝族至今还保持着这一传统。另外，比如还有崇拜山神和祭山的共同习俗。这说明，藏缅语族各语支民族确是曾从同一个母体分化而来的。

其二，现居川滇乃至南亚一带的藏缅语族各民族都有从北方迁来的传说。正如李绍明先生所言：“六江流域藏彝走廊上居住的藏缅语族各民族都有着一部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①李绍明先生还根据历史文献、民族语文典籍以及口碑等材料，来论证了这一“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加之，藏缅语族各民族多是以水流来定方向，水头为北方，正反映了“藏彝走廊”的地貌特征。这说明，藏缅语各语支族群都是从河流上游及源头地区顺河流而往下迁移的。

其三，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虽然同出自于一个母体，但彼此仍有相当大的差异。不同语支民族在文化上也有明显差别。各民族的迁徙传说有着不同的迁徙起始地，例如，羌族言其先民来自西北甘青地区，彝族有彝文典籍记载其先民来自“牦牛徼外”，纳

^①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形成，以及要在一个广阔而复杂的空间范围内推进和实现这种文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经历若干发展阶段。“藏彝走廊”不过是中国地理空间中的一个特定地带。因此，“藏彝走廊”的历史与古代中国农业文明发展史相应，其活跃期也经历了一个由若干阶段组成的相当长的过程。故活跃期相应可分为四期。

一期（公元前 2100～公元前 1100 年）：

“藏彝走廊”活跃一期相当于中原夏、商王朝时期。考古及历史文献记载有关这个时期“藏彝走廊”的资料很少，故只能作一些粗略判断。“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开始出现石棺葬文化。与“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关的宝墩文化及广汉三星堆一期文化，自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出现在川西山前平原以后，一直延续存在和发展至夏商之交。多数学者都认为，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所部，是最先从岷江峡谷走出到成都平原西部边缘的族群之一。也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第二代蜀王柏濩（或柏灌）所部，可能先于蚕丛氏进入平原边缘。宝墩早期文化可能就与柏濩族群相关。三星堆一期文化可能与蚕丛氏相关，而二期以后则可能与鱼凫族群相关^①。笔者的意见（或推测）如下：

蚕丛氏是借岷江通道东进南下的古藏缅语族人群之一。蚕丛所部最先从岷江峡谷走出灌口，来到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宝墩文化即与之相关。与蚕丛氏相近的族群抑或蚕丛氏族群中的一些，还沿着岷江及成都平原西沿进至青衣江流域，乃至岷江下游。这在青衣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有所反映。柏濩族群也是借岷江通道迁移的古藏缅语族人群之一。不过，柏濩族群不是从灌口，而是越过湔山（茶坪山）从成都平原西北角进入平原的。三

^①段渝：《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星堆一期文化当与柏濩有关。鱼鳧或许与柏濩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大概在夏初，蚕丛即为平原西部各酋邦的大首领，号称“蜀”。

另外，广元中子铺下层文化可能反映的是经过“藏彝走廊”北端沿白龙江或大巴山脉东进的古氏羌人群活动。这支人群中的一部分继续沿大巴山向东即向巫山地区运动，另一些则留了下来，并向南伸展，与绵阳边堆山文化连成一片。这支沿龙门山东侧分布的人群即可能构成《山海经》所载的“氐人国”。“氐人国”以鱼为族徽，《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柏濩与鱼鳧同族，均以食鱼禽类为族徽。鱼鳧即俗称水鸭子。柏濩，也记为柏灌，即伯灌。当是《山海经》所载之“灌头”或“驩头”。《山海经·大荒南经》载：“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灌头。灌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飞……有灌头之国。”《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载：“颡项生驩头。”伯灌、鱼鳧与“氐人国”，同属古藏缅语族群，或许还是对婚族群。如《山海经》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颡项死即复苏。”鱼妇，半人半鱼，当属以鱼为图腾的颡项之母族族群，当然也属“驩头”即柏灌的母系祖先族群。由于各族群的发展，柏灌与“氐人国”两族虽关系密切，但毕竟属不同支系，甚至相互为敌。大概在夏末（公元前1700年前后），柏灌向北扩张，征服了“氐人国”，取代蚕丛而为蜀王。（“氐人国”一些不服蜀国统治的遗民，则沿其祖先迁徙的路线，逃往白龙江上游地区。）鱼鳧是继承柏灌而为蜀王的。鱼鳧时期（约当商代），蜀进入辉煌的青铜时代。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面平雕文饰图案，分为鱼、鸟、人头三组。一般认为这是鱼鳧王的标志。有学者认为人头部分代表蜀王，鱼、鸟分别代表具有“上天、潜渊”的神性。林向先生更是直接将三



组图案释读为：“鱼、鳧、王”^①。笔者以为，图案中两箭头直射入鱼的头部，象征对鱼图腾部落的征服和统治；鸟图案不是鳧，而是“獐头”，亦即柏灌的标志；人头图案表示蜀。全组图案的意思大致是：统治鱼族的蜀王柏灌。

“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嵩等处”^②，这是沿“藏彝走廊”向南远徙的部分。蚕丛族群另有一些则向南就近流入青衣江流域乃至岷江下游地区，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古藏缅语族群会合，其中有被称为“蒲”或“𪔐”的人群。杜宇即出自青衣江或岷江下游族群，甚至属蚕丛旧部。杜宇率部北上，取代鱼鳧为蜀王，其时大约在商末。杜宇率蜀国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会盟。《尚书·牧誓》八国中，至少蜀、羌、髳三个方国的部分势力与“藏彝走廊”区域相关。尤其是“髳”，当为牦牛族群，到秦汉时已是“藏彝走廊”中的一个庞大族体。

公元前 1100 年前后，蜀、羌、髳等国参加中原大战，云南考古发现始有青铜器出土；“藏彝走廊”中石棺葬文化开始遍布。这些既标志着“藏彝走廊”活跃期第一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活跃期第二阶段的开始。

二期（公元前 1100～公元前 250 年）：

“藏彝走廊”在这个时期里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石棺葬文化的流行。目前已发现或发掘的石棺葬集中分布于岷江上游地区、大渡河—青衣江流域、金沙江—雅砻江流域及滇西北地区，几乎遍及整个“藏彝走廊”。笔者曾提出“石棺葬文化带”是“藏彝走廊”七大历史文化特征之一，并未加考证地断言：“实行或遗留下

①段渝：《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唐·张守节《正义》云：“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嵩等处。”



石棺葬的古代族群，是一个操古藏缅语的相当大的族群集团”，“多半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就从高原进入到切割高原的峡谷地带”。“这个族群集团，在先秦，就是习居‘石室’或‘重屋’的民族，也就是发明或最早从事山前农业和养猪的民族，同时也是以牦牛为总图腾的、实行母系制的民族。至秦汉，这个族群集团除一些融入其他民族集团而外，大多都属所谓‘徼外夷’。也就是《史记》所载‘或土著，或移徙’的徙（斯榆）、笮、冉、骍等族群。其中包括蚕丛及古蜀遗民等”^①。据考古研究推测，石棺葬文化的年代从夏商开始，至西周以后兴盛，到东汉初而衰落。最早的石棺葬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100～公元前 1100 年间，没有任何金属器，出土陶器、石器与当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同类器物的质地、形制、制法一致，说明石棺葬文化是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自行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文化，因而是这个时期“走廊”内藏缅语族各历史民族的文化。至“藏彝走廊”活跃期的二期，石棺葬出现青铜器乃至小铁器。这个时期后期石棺葬的青铜器，颇受滇文化的影响。说明“藏彝走廊”中的文化发展落后于平原及盆地地区，并且南北向的交往关系更加密切，胜于东西向的联系。

公元前 1000 年前后，在“藏彝走廊”南段，有一支属藏缅语族缅语支的人群沿怒江、澜沧江通道南下，尔后进入今缅甸境内。这支人群即是今缅甸族的先民。据缅甸史的研究，属藏缅语族的缅人先民最初来自于青藏高原东部（有说是从阿尔泰山经青藏高原而迁入缅甸的）^②。缅人经“藏彝走廊”迁入缅甸的时间，说法

^①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载《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1、2 期。

^②分别见：G. E. 哈威著，姚枬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什那伊杰尔著，李希泌等译：《缅甸》，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不一。有说在公元前 6 世纪，有说在公元 4 世纪^①。而据缅甸的传说，早在公元前 9 世纪时，缅族前身的骠族就已经在伊洛瓦底江中游的太公城附近建立了国家，称为“旧蒲甘王朝”^②。笔者的意见倾向于古缅甸支族群迁入缅甸的时间较早，大概就在传说的公元前 9 世纪。缅族先民自伊洛瓦底江上游向下游运动，与先期到达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操孟高棉语的农业族群，经过长期反复的冲击较量，终于在公元前 5 世纪以前赢得在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的统治权。如果没有近 3000 年缅人先民入缅的历史，缅甸族几乎不可能发展成为像今天这样拥有近两千万人口的大族。缅人的先民在“藏彝走廊”中，可能与澜沧江上游卡若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关。卡若遗址出土农作物有粟而无麦。而缅族先民在伊洛瓦底江向孟族学会种稻以前，大概主要是种粟，直到唐代都不知种麦，如《唐书·南蛮传·骠国》载：“土宜菽粟稻粱，蔗大无脰，无蔴麥。”

大约在公元前 700 年，即在春秋初期，“藏彝走廊”东侧的杜宇蜀国为开明王朝所取代。开明大概与杜宇一样也是来自青衣江流域或岷江下游，与“蒲”或“夔”也有关，应与杜宇属同族。《水经·江水注》云：安南（即今乐山）“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獠夔。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第三世开明帝即保子帝攻青衣，约在公元前 600 年。

^①分别见什那伊杰尔著，李希泌等译：《缅甸》，三联书店 1965 年版；波巴信著，陈炎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②赵松乔：《缅甸地理概述》，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版。



笔者以为，春秋时期，青衣江流域当为邛人的聚居地带。邛人是早先沿岷江或大渡河通道迁来的古藏缅语族群的一支。前文已述，“与蚕丛氏相近的族群抑或蚕丛氏族群中的一些，还沿着岷江及成都平原西沿进至青衣江流域，乃至岷江下游”。这些即形成邛人。史籍载：“邛崃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①“邛人自蜀入，南人毒之，曰邛笮”^②。邛崃山是青衣江流域与大渡河流域的分水岭。“邛人自蜀入”，这说明邛人在大渡河以东及以北邛崃山外侧（即东北侧）一带。“笮人”则分布于邛崃山内侧即西侧，故曰邛崃山为“邛人、笮人界也”。邛崃山之名定是在邛人南渡大渡河向南迁徙之前形成的。《华阳国志》还载：“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这说明邛崃山东北侧的青衣江流域在秦以前确曾是邛人的聚居地。

邛人又称青衣，以着青色服装而得名，尔后青衣又由族名转化为地名。蚕丛遗民即居青衣。古籍载：“蚕丛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③故青衣或邛人以丛为神，号曰“丛”（亦即“邛”），或曰“神丛”^④（即后世民间所传之“青衣神”）。由此之故，来自青衣江或岷江下游的开明得蜀王位，必以“丛帝”为号；九世开明帝立宗庙“以五色为主”，必以“青”色居于五色之首。当然，居青衣之邛人虽原属蚕丛国民，但因长期囿居于青衣之地，又历经上千年的兴衰更替，故至后世蜀国，已被视为边民，乃至被后世史家视为蜀国之夷种^⑤。

①《续汉志》严道县、旄牛县下刘昭注引《华阳国志》佚文。

②《华阳国志·蜀志》。

③《蜀中名胜记》卷15。

④《战国策·秦策三》载：“应侯谓昭王曰：‘亦闻恒思有神丛与？……’”

⑤《华阳国志·蜀志》载：“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嶲，蜀曰邛，皆夷种也”。



保子帝攻青衣，迫使邛人大举南迁。邛人向南越过邛崃山脉之大相岭，在大渡河南北两岸一带停留了一些时间。然后继续南下入安宁河流域。到战国末，邛人在越嶲至今西昌及安宁河下游一带，可能已建立起了西汉时司马迁所言之邛都国，故后有“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嵩等处”之说。另外，邛人大举迁出青衣地区时，可能有一支邛人没有南越大相岭，而是向西或西北越过二郎山或夹金山，进入大渡河峡谷地区。在大渡河上游大金川峡谷地区至今还留有“邛山”、“邛水”的地名（今属四川甘孜州丹巴县）。今居住在邛崃山西侧大渡河峡谷地带（属康定县鱼通乡）有一支自称“哥邛”的族群（现属藏族），可能就是古代邛人的后裔。据“哥邛”人记忆，又据学者研究，“哥邛”人的先民最初居住在邛崃山东侧即今天全一带，后迁移至邛山，再后才从邛山顺大渡河迁移到今鱼通地区。“哥邛”人后来也有从大渡河南迁至安宁河地区的。

战国末，中原地区已处于帝国前夜。由于秦国（献公时，公元前384～前361年）向西扩张，迫使西北河、湟一带的西羌族群始向西向南迁移。其中一些通过“藏彝走廊”北端和西北端几个入口，先后进入“藏彝走廊”，南迁最远的一支到达雅砻江及安宁河中下游地区。其史事数百年后才见于记载，故只能知其大略，如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鼂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①。所谓广汉羌、武都羌，是沿岷山东北侧南折进入

^①《后汉书·西羌传》。



白龙江及龙门山东麓一线。越嶲羌则大概是自青海经雅砻江通道（或亦经大渡河通道）而进至大渡河及安宁河中下游地区的。

公元前316年，秦伐蜀，蜀亡。一些南迁蜀国遗民，在青衣江流域曾有过短暂停留，而后继续向南中撤退。最远可能在秦汉时已到达今滇西南保山、腾冲一带。如《史记·三代世表》所载：“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史籍还载：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①。所谓“戎伯”当指原蜀国西部山区诸族落首领。说明蜀亡后，“藏彝走廊”中被后世称为“羌、夷、氏”的族群尚有相当实力。

与蜀亡差不多同时，古滇国在今云南昆明一带正值兴盛。滇国中的濮越系民族始向西向北拓展势力，在“藏彝走廊”南段一带与藏缅语族群发生接触、冲突、交流和融合。故战国末至秦汉时期，“藏彝走廊”的石棺葬文化多有滇国青铜文化的影响。

三期（公元前256～公元317年）：

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心的社会政治开始步入帝国时期，“藏彝走廊”一些地方始纳入帝国行政建制。秦灭蜀后，在“藏彝走廊”方面用兵，唯见《华阳国志》所载“周赧王三十年，张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也”。表明秦军曾深入到大渡河以南或以西的笮地。此“江南地”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指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以南地带，而可能是指楚地之“江南”，抑或指岷江以南，即今犍为、沐川、屏山及马边、峨边一带。张若的军事行动为秦自焚道沿“藏彝走廊”东南侧开辟通往云南的“南夷道”，即“五尺道”，奠定了基础。

^①《华阳国志·蜀志》。



从秦于公元前 301 年在今四川最初设立蜀郡的行政建制，到秦始皇时期，蜀郡领县可考者仅 12 县。在这 12 县中，与“藏彝走廊”稍有关系的大概有临邛县（今邛崃、大邑、蒲江一带）、严道县（今荥经、天全一带）、湔氐县（今松潘一带）、犍道县（今宜宾一带）。而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说明秦时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及金沙江流域，都曾设立了行政建制，只是分布稀疏，尚不稳固，故“至汉兴而罢”。

两汉至西晋末（公元前 206～公元 317 年）500 余年间，在“藏彝走廊”及与之相关的地方，行政建制大致如下：

西汉置 益州蜀郡（后又分置出汶山郡、沈黎郡）所领临邛县、青衣县（今芦山县一带）、严道县、绵虬县（今汶川县一带）、旄牛县（今汉源县一带）、徙县（今天全县一带）、湔氐道、汶江县（今茂县一带）、广柔县（今理县、汶川一带）、蚕陵县（今茂县叠溪一带）；广汉郡所领刚氐道（今平武县一带）、甸氐道（今九寨沟县一带）、阴平道（今甘肃文县一带）；犍为郡所领犍道县、朱提县（今云南昭通一带）、堂琅县（今云南东川、巧家一带）；越嶲郡所领邛都县（今西昌一带）、零关县（今甘洛县一带）、台登县（今冕宁县一带）、定笮县（今盐源、攀枝花、木里及云南宁蒗县一带）、会无县（今会理县一带）、笮秦县（今冕宁、盐源交界一带）、三絳县（今攀枝花一带）、苏示县（今西昌礼州一带）、阐县（今甘洛县一带）、卑水县（今宁南或美姑县一带）、大笮县（今攀枝花盐边一带）、青蛉县（今云南大姚县一带）、姑复县（今云南永胜县一带）、瀛街县（今云南永善县一带）、遂久县（今云南丽江一带）。

东汉置 益州蜀郡所领临邛县、湔氐道，后分置汶山郡，汶



山郡领汶江道、蚕陵县、湍氏县、广柔县、绵虬县；犍为郡所领犍道县、朱提县；越嶲郡所领邛都县、台登县、卑水县、三絳县、会无县、定笮县、阐县、苏示县、大笮县、笮秦县、零关道、遂久县、青蛉县、姑复县；汉嘉郡所领汉嘉县（西汉青衣县）、徙县、旄牛县、严道县；广汉属国所辖刚氏道、甸氏道、阴平道。

三国蜀汉置 益州蜀郡所领临邛县、湍县（今都江堰一带）；犍为郡所领犍道县；汶山郡所领绵虬县、氏道县（汉湍氏道）、平康县（今松潘县一带）、白马县（今松潘县一带）、蚕陵县、广柔县、升迁县（今黑水县一带）；汉嘉郡所领阳嘉县（汉青衣县）、徙县、严道县、旄牛县；越嶲郡所领邛都县、会无县、卑水县、定笮县、台登县、苏祈县、三絳县、阐县、马湖县（今雷波县一带）、安上县（今峨边县及新市镇一带）、新道县（汉零关道）、濞街县；阴平郡所领刚氏县、阴平县；荆州朱提郡所领朱提县、南广县（今云南盐津县一带）、堂琅县；建宁郡（涉及今会理会东金沙江以南一些地方）；永昌郡所领嵩唐县（今云南云龙县一带）、博南县（今云南永平县一带）；云南郡所领桥栋县（今云南姚安县一带）、青蛉县、姑复县、牂榆县（今云南大理一带）、遂久县。

西晋置 益州蜀郡所领临邛县；汶山郡所领汶山县（东汉汶江道）、升迁县、都安县（今都江堰一带）、广阳县（今茂县一带）、兴乐县（今松潘县一带）、平康县、蚕陵县、广柔县；汉嘉郡所领汉嘉县、徙阳县（汉徙县）、严道县、旄牛县；越嶲郡所领会无县、邛都县、卑水县、定笮县、台登县、护龙县（今甘洛县一带）、苏利县（西汉苏示县）；秦州阴平郡所领平武县（今青川、平武县一带）、刚氏县。

秦至魏晋，主要是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金沙江及安宁河地区设置郡县，即大体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以西的“藏彝



走廊”地区。因而这个地区的古代通道亦为官方所重视。“秦时常頌略通五尺道”；汉时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僊道指牂柯江”，司马相如“略定西夷”，“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于是，在大凉山两侧“藏彝走廊”通道的基础上，开通了联系川滇的两条官道，即所谓南夷道和西夷道，亦即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东西两条干线。

先秦文献记载的有关“藏彝走廊”的历史民族或族群，多语焉不详，而自“藏彝走廊”部分地区设置郡县和开辟官道以后，即有众多的历史民族始见于正史。《史记》单列了《西南夷列传》，其开篇即言：夜郎、滇（靡莫之属）、邛都、嵩、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氏类），“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司马相如列传》及《大宛列传》还记有斯榆、苞满、西僊或僊等历史民族。按司马迁的分类，除统称西南夷外，又分南夷和西夷。夜郎、僊（或苞满）属南夷；邛、笮、冉駹、斯榆，属西夷；其他如滇、嵩、昆明、白马（氏）未作区分，当统属西南夷。在《史记》记载的西南夷中，邛、笮、冉駹、徙、斯榆、嵩、昆明、白马等均属“藏彝走廊”中的历史民族或族群。

邛，前文已述，笔者以为邛人原居青衣江流域，春秋时始向南迁，在安宁河流域与先期到达那里的居民相会。那些居民包括：新石器时代即到达那里的一些古藏缅语族群后裔、蚕丛时南迁的蜀人或蜀国属民遗裔、西南迁的一些僊人，以及一些滇越民族。到司马迁时，以邛人为主体的在安宁河中下游地区已建立起“耕田，有邑聚”的邦国。

笮，从“邛崃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可知，笮人至迟在春秋以前就是“藏彝走廊”中的历史居民。笔者以为，笮人先民是新石器时代自青藏高原通天河地区沿雅砻江或大渡河



上游通道进入“藏彝走廊”的古藏缅语族群的一支。这支人群以旄牛为族徽，后来成为彝语支民族。大概在商周之际，笮人从雅砻江或大渡河上游已东进至邛崃山西侧和西南侧一带。公元前600年前后，邛人大举撤离青衣江流域，笮人东进前锋可能已到达大渡河下游及岷江下游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从唐蒙“自僊道指牂柯江”的路线来判断，“笮关”当在今川南一带。说明这一带已接近笮人分布地区。汉初，笮人广泛分布于雅砻江及大渡河中下游地区，西汉蜀郡（后分置沈黎郡）所领旄牛县，越嶲郡所领定笮、笮秦、大笮等县，都是笮人分布地区，旄牛则是笮人的大本营。大概由于滇人向北扩展势力，笮人可能有过局部北移的过程。司马迁时，笮人的中心区域仍在旄牛，即在邛都东北大相岭南侧一带，“其俗或土著，或移徙”。中心区域即旄牛一带的笮人最早与其他民族融合。

徙（斯榆），长期以来，多数学者都认为“徙”亦即“斯榆”，即后世所记之“斯儿”、“斯叟”、“叟”等，属蜀国遗民，“叟”即“蜀”。笔者同意“徙”即“斯榆”的看法，也同意“斯榆”即后世所记之“斯儿”、“斯叟”、“叟”的看法，但笔者不同意“徙”、“斯”或“叟”是蜀人遗民的看法。笔者以为，“徙”属西北移民。据《华阳国志》载：秦时“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又载：“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笔者认为，“徙”或“斯榆”就是秦时所移西北居民以实青衣江流域的移民群体。这些群体聚居今天全、始阳者，称其迁入地为“徙”，地名同时又被当作族群名。“徙”，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移民的含义。徙人或来自于上郡，其中可能有属匈奴（或南匈奴）族系的群体，在人种特征上，属“高鼻深目”类型，具有中亚塞



种人血统，“其俗或土著（定居农耕），或移徙”。汉时，有一些徙人已南迁至邛都地区，或招募为部曲。后世史家记之为“斯儿”、“斯叟”或“叟”。任乃强先生即认为：“‘汉代谓蜀为叟’的说法，在《孔传》外，并无更多的证验”；“叟为汉民加于羌戎之称，有渠叟之义，而无蜀国之义”；“周人所谓渠叟”，“为西戎、北狄和月氏三部族的中介部落”^①。张增祺先生从考古学角度也断定“斯”、“叟”属塞种人^②。

冉骊，典籍记载甚略。笔者推测，冉骊是新石器时代自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及甘青一带沿大渡河上游及岷江上游通道进入“藏彝走廊”的古藏缅语族群的一支。这支人群广泛分布于岷江及大渡河峡谷地区，主要是形成羌语支民族的先民。由于冉骊所在地区正当通道要冲地带，加之战国时期羌人南迁，致使当地历史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后汉书·冉骊夷传》云：“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也。”故冉骊之民族融合及文化涵化发生时间很早。用回溯的眼光来看冉骊，或冉、骊，其作为单纯的族系，已不可知。所能够知道的已经是比较混杂的族群了。其中有古蜀人先民，有较早的夷人，有稍后来的氐人和后来的羌人，甚至还融有笮人、斯人的因素。就大略而言，笔者以为，后世所称“嘉尔莫”的族群（即隋之嘉良夷、唐之东女国、今之嘉戎）是冉骊遗民重要的一支。“嘉尔莫”即冉骊的对音。大渡河古称（西汉以前）沫水，沫当是“嘉尔莫”亦即“冉骊”的汉语音译的简称。在大渡河峡谷地区至今尚保留着称大渡河为“嘉尔莫”的民族语称谓（全称为“嘉尔莫俄曲”，大渡河古代又称泔水，亦属“嘉尔

^①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②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莫俄曲”汉语音译的简称)。“嘉尔莫”，嘉戎藏语意为“大女神”、“女王”，大渡河亦即女神河或女王河。冉骊，其意自然亦当为大女神。此与文献记载冉骊其俗“贵妇人，党母族”^①，正相合。

白马，《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为神话时期“藏彝走廊”中的族系。以鱼为总族徽。史载：鲧死，“化为玄鱼”^②。这支族群经岷山沿白水河及白龙江进入嘉陵江流域，在龙门山东侧一带建立了所谓“氐人国”。后被柏灌蜀国征服。一些氐人逃回白龙江上游；另一些则避居于嘉陵江支流涪江上游及白水河一带山区，这部分即为《史记》所称“皆氐类”之“白马”。笔者曾在《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一文中提出，今聚居于四川平武涪江上游一带的白马藏人实属古代白马的直系后裔。白马是古藏缅语缀有女性词根的人称。文献记载的白马或鲧，当为女性。《山海经》载“鲧复生禹”，即谓禹产自鲧之母腹。古代白马及今之白马藏人均是以前母祖名号为族称。至今，白马藏族女性均挂鱼骨牌于胸前，作为服饰，用以纪念其白马先母祖^③。

𪛗，笔者以为，𪛗作为族群就是邛人（或为邛人集团中一支），是早期蜀国遗民，是以一种短尾鸟为族徽的古蜀遗民。𪛗，作为地名历来读音为“西”，古音作“髓”。其实，𪛗字还从“𪛗”声，音与“邛”通。汉许慎《说文解字》云：“𪛗，周燕也，从隹（按：音 zhui，鸟之短尾），中象其冠也，𪛗声。一曰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慙，亡去，为子𪛗鸟，故蜀人闻子𪛗鸣，皆云望帝。户圭切。”说明𪛗为“周燕”，从“𪛗声”；为子𪛗鸟，读音“户圭

①《后汉书·冉骊夷传》。

②《拾遗记》卷2。

③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载《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2期。



切”。在“𪔐”字下，许慎云：𪔐，“司马相如说从𪔐”。“𪔐”其音亦与“邛”通。

开明蜀保子帝攻青衣，𪔐（邛）人南迁越过大相岭，在大渡河南北两岸一带留居了一段时间。这段大渡河或在此段汇入大渡河的重要支流，即今越西河（原名越𪔐河），因𪔐（邛）人聚居而称之为“𪔐（邛）河”或“𪔐（邛）水”。由于𪔐（邛）人南迁，而𪔐（邛）即被他称为“蜀”。（今凉山彝族称子𪔐鸟即为“蜀布”或“蜀”；有说“蜀”是一种野鸡。笔者按：或蜀之“文翰”、“皋鸡”。）𪔐之自称的“邛”音遂转变为他称之“髓”，尔后又音变为“西”。𪔐（邛）水也随之变为𪔐（髓）水、𪔐（西）水。此𪔐水即西汉越𪔐郡得名之𪔐水。蒙默先生认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载“元鼎六年，汉兵自越𪔐水伐之，以为越𪔐郡”，当读为“汉兵越‘𪔐水’伐之，以为越𪔐郡。”^① 笔者以为甚是。

𪔐水以𪔐人而得名。𪔐人南迁最远者，按文献记载秦汉时已到达了今滇西永平、保山一带。这支人即司马迁所云“𪔐昆明”之“𪔐”。《史记》所载“越𪔐郡”之“𪔐”，是由族名转化的地名；“𪔐昆明”之“𪔐”，则是族名。这支𪔐人可能是自邛都一带顺安宁河下游渡过金沙江，经今云南永仁、大姚、姚安、弥渡，而至永平、保山一带的。东汉时在永平、保山一带置𪔐唐县。任乃强先生说：“𪔐唐显然是取当时𪔐种集中居住地之义”^②。滇西之𪔐（唐）又转化为地名。故后世史家言：“蚕丛国破，子孙居姚、𪔐等处。”言“姚、𪔐”，而不言“𪔐、姚”，说明姚近蜀，𪔐更在姚以远。故此处所言之𪔐，非指越𪔐，当是指𪔐唐之𪔐。《史记·

①蒙默：《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②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三代世表》所载“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的“蜀王”，亦当是指嵩唐一带的蜀国遗民嵩人的首领。司马迁未到过“嵩、昆明”之地，而依传闻以嵩比昆明，言“皆辩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其实未必。

昆明，任乃强先生最先对《史记》所载之“嵩、昆明”作出比较详细的考订^①。笔者基本赞同任先生对“昆明”一词的诠释以及关于昆明族源的看法。昆明或昆弥是来自青藏高原雪山地区的古藏缅语族群一支的自称。如任先生所说，这支人出自《禹贡》所谓昆仑，即河源的昆仑。笔者推测，大概在缅语支族群南迁以后，昆弥人即向南进入“藏彝走廊”，并采取差不多与缅语支族群相同或邻近的路线，即沿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的通道南下。秦汉时已到达“藏彝走廊”南端出口地区，即来到“澜沧、金沙两河谷间的洱海高原”。《通典》所云“西洱河一名昆弥川”，“古有昆弥国”，或即此部（任乃强）。据任先生判断，昆明族尔后融入汉族的速度相当快。笔者以为，走出“藏彝走廊”的昆明人尔后向东及东北方向发展的，有一些成为了彝语支民族。而向南运动或保留原地一带的，有一些则成为了缅语支民族。

𐏊，或西𐏊（苞满），𐏊人（或濮人）之最早来源实已不可考，其作为历史族群的产生远在有文字史以前。因而当后世记录时其族群渊源其实已相当复杂。无疑是最难考订的历史族群之一。学术界将𐏊人不是归为氐羌系统，就是归入濮越系统，历来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依笔者之见，从族源上说，𐏊人（濮人）是融合了不同语族人群因素的一个多元（源）化历史族群。其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来源：一是古藏缅语族群，一是古壮侗语族群。这种

①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多元（源）融合产生的原因在于，夔人（濮人）先民是最早进入冲积平原地区的农业族群之一。尔后，由于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的形成和扩张，未融入文明中心区域而被排挤出来的部分，其中一个集团即构成夔人（或濮人）。

笔者以为，大概距今七八千年前，就有古藏缅语族群经“藏彝走廊”北端向东沿大巴山脉或汉水河谷，进至巫山以东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山丘地区。广元中子铺文化遗址即可能与东进的古代族群有关。这些族群在长江中游一带与古壮侗语族群相遇。并可能从古壮侗语族群那里习得稻作农业。由于稻作农业文化的共同性，而逐渐形成大体操两类语言的共生的族群集团，并从“后来居上”的农业集团那里，获得“濮”这个共同的他称。最初见诸文献记载的濮，实际已是群体庞大而渊源复杂的族群集团，故史称“百濮”。

汉代文献记载的今川南宜宾一带的夔人，或西夔（即在西方的濮人），其来历笔者以为有两种可能的判断。其一，夔人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经“藏彝走廊”最先沿岷江和川西平原边缘南迁而来的古藏缅语族群一支。这支人在川、滇、黔交界一带与长江以南的古壮侗语族群相遇，并发生了族群和文化的交融。从而形成在川滇黔交界地区实行稻作农业较早的历史族群。同时也构成后来被他称为“濮”的集团组成部分。其二，夔人可能是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的濮人一支，因受到中原扩张势力的排挤或其他原因，而从巫山、武陵山方向向西迁移至川南一带的。任乃强先生即持类似这样的意见^①。

不过，无论夔人来自哪里，似都可以断定，早在夏商时代，

^①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夔人就已经在今川南宜宾一带了，而且可能远至西南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流域地区。周时即有“夔侯国”与巴、蜀交邻。夔与蜀同具有古藏缅语族群血统，颇有渊源关系，或者在夏商时期就与青衣江古蜀族群早有姻娅联系。杜宇、开明都是出自与夔人有很深关系的古蜀族群。春秋时，蜀开明保子帝攻青衣，邛人南迁后，一些夔人随之也迁入青衣江流域。大概自秦汉开夔道以后，夔人始从宜宾一带大量向南及西南方向迁移。到常璩时，宜宾一带实已没有什么夔人了，只留得夔或夔道之古名。如《华阳国志·蜀志》载：“夔道县：……本有夔人，故《秦纪》言夔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

以上大体为汉代文献记载的当时“藏彝走廊”主要的历史民族或族群。从稍后的《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典籍记载来看，至东汉时，昆明人一些已东移至滇池附近。僇人活动于川滇交界一带。徙或斯榆大量南迁至安宁河流域，加入邛人集团。在邛都，《华阳国志》及《后汉书》已有大量关于斯、叟的记载，如“四部斯儿”、“斯都耆帅”、“越僇斯叟”、“越僇叟”、“苏祈叟”等等。关于笮人的记载，更加具体。“摩沙夷”见诸《华阳国志》；“旄牛夷”、“白狼、槃木”、“楼薄蛮夷”等，见诸《三国志》和《后汉书》。

笮人，或“笮夷”、“笮都夷”，或“旄牛夷”，如《华阳国志》云：“汉嘉、越僇曰笮……夷种也。”如前所述，笮人以旄牛为总族徽，最早来自于雅砻江源头地区。笔者据文献记载推测，东汉时，笮人分两大部：其一部为旄牛，或黑部，大体分布于雅砻江及安宁河流域。主要有“摩沙夷”。其一部为白狼，或白部，大体分布于大渡河及雅砻江流域。主要有槃木、楼薄等支系。旄牛、白狼两部世有联姻，且与邛都邛人或叟人建立有姻亲关系。如见



记载：“（摩沙）夷帅狼岑，槃木王舅”^①；又：“苏祈邑君（《后汉书》载为‘苏祈叟’）冬逢……逢妻，旄牛王女……汉嘉郡界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其率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抱怨”^②。摩沙夷，即今摩梭、纳木依等族群的先民。白狼槃木，即今柏木依、普米等族群的先民。

东汉初，白狼槃木、楼薄等旄牛徼外族群先后“举种贡奉”、“归义内属”^③，白狼人向东运动已分布于邛崃山西侧一带。其中一些已越过邛崃山，进入青衣江流域。东汉安帝时，“旄牛夷”复叛^④。大概自此之后，由越嶲经旄牛至成都的古旄牛道，即汉之零关道，因“旄牛”为患，而绝道百余年^⑤。直至三国蜀汉张嶷为越嶲太守时，才又“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⑥。

①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②《三国志·张嶷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④《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⑤⑥《三国志·张嶷传》。